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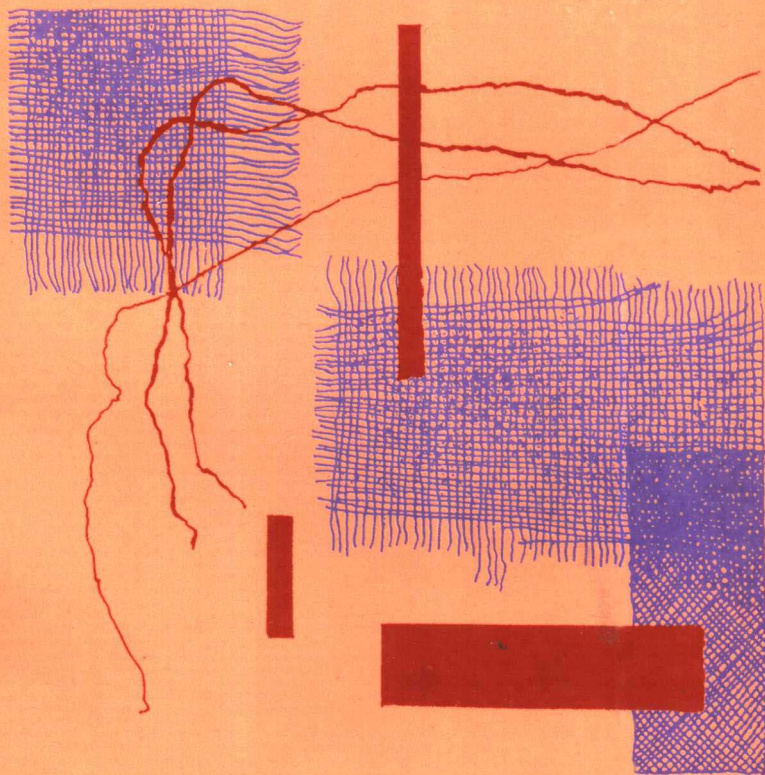
ZHUTISIWEI YU WENXUE SHIGUAN •



主体思维 与文学史观

● 朱德发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

朱德发 著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经八纬一路 321 号

出版日期: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用纸规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12.875 印张 4 插页 290 千字

制版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书 号:ISBN 7—5328—2470—5/I·65

定 价:14.70 元

引 言

人的不同选择总是有不同的追求目标，选择跳高者所追求的是高度，选择潜水者所追求的是深度，选择旅游者所追求的是广度。虽然要达到其各自追求的目标并非容易，但是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毕竟不同于学术之路。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既要有高度又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更不如前者可以进行定量分析。它缺乏硬指标，只能以弹性价值尺度来衡量；特别在当代，社会人文学者的学术水平如何评价更难了。这不仅因为人际关系的微妙复杂致使公正的评论越来越少、“吹捧风”越刮越盛，也因为某些学者出于强烈的功利之心采取经商手段找人来吹捧来包装，贴上花花绿绿的标签，既弄乱了评估学术价值的标准，又炮制出一批平庸低劣的所谓“学术专著”。在这种状况下，做个诚实的学者难，做个诚实的评论者也难；缺乏诚实的学者和诚实的评论者，学术领域这片圣洁的土地怎能拒斥污染？图书市场正在整顿，大概那些劣质的“学术专著”也该受到冲击吧？只要有了诚实的学者和诚实的评论者，有了正常的学术气候和公正的价值尺度，人文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是会达到的，虽然并不容易。

感谢改革开放为我走上学术之路提供了机遇。虽然我没有三级跳的技能，没有攀登高峰的雄心，更没有百米冲刺的速度；但在这十几年间我并没有停下学术追求的脚步，任凭吹什么风，我选择的既定方向从未动摇过，即使跳不起来、跑不起来，甚

至带着镣铐，也要向学术研究的深、广、高三度目标挺进，生命不息，追求不止。这也许是我的愿给自己出难题、愿对自己过不去、愿为自己加压力的好强性格所致，也许与我把治学作为体现某种精神价值的人生选择有关，也许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迫使我不能不像鲁迅笔下的过客一样明知前面是坟场也要冲向前。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学术之路，只要有了这种进击的精神，那怕达不到追求的目标倒下了，也是对自己对历史作了负责的交代。

近几年在学术之路上，我感到最大的难题也是最大的困惑是，致力于文学史研究受到一定的冷落且不说，学术总体水平难以提高，一些失去活力的文学史观和思维模式也难以超越，这倒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热切关注的。我虽然深知自己并不具备老学者那种广博而精深的学识与才情、持重而厚实的学术功力，但我却有一种追求学术独立、探索自由的心愿和敢于走出巨人阴影、冲破清规戒律的挑战性格。这并非傲视前辈，对巨人不敬或自恃高明、目空一切，而是一个有进取意识的学者必具的心理素质，即使在挑战中所获甚微乃至失败了也不必懊悔。正是基于此，这些年我选择了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着眼于思维学与文学史关系的考察，自觉地反思在撰写文学史过程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坚持的操作规则、形成的文学史观念和思维模式、惯用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等。对于文学史研究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并从中寻出正确答案，自认为是当前文学史研究大幅度提高质量的关键所在。大凡人都有超越自身思维惯性突破僵化传统规范的潜在能量和变革意识，这在那些真正锐意创新、敢于超越前辈、立志“重写文学史”的年轻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既然选择了学术之路就要坚定地闯关，于是

我便不断地挖掘身上仅存的一点潜能，不断地张扬头脑中仅有的一点变革思想，一方面总结自己和学习他人的那些在文学史研究中之有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以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一方面遵循各种思维规律和不同思路尝试性地开拓文学史研究的新天地，依仗思维的特殊功能和威力试图打通“中国新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联系；另一方面强化自身文学史观念的调整和更新。这对于文学史研究能否具有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它既与主体思维模式的调整联系在一起又与文学史研究实践操作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主体思维范型的研究带动了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操作推动了文学史观念的变革，而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则又是主体思维模式调整和文学史研究实践的导向。依据这个总体逻辑思路，我从三个大的层面既有联系又有分工地进行研究和探索，写成这部“形散神凝”的自成体系的著作；又是根据这个总体构想，将相互照应相互联结的三个大板块组成这本书的理论框架。而这个理论框架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反映了笔者突破已有文学史研究的僵化格局的主观意图及对本书将产生的社会客观效果的一种向往。但，写书毕竟不是为了自我欣赏，总是要面向读者，请专家评点；特别本书多为探索之言，加之才疏学浅、时间仓促，误漏在所难免，企盼指正。

从事学术研究者有种同感，写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真难，但出版一本有学术价值的书更难，这除了经济的原因外，重要的是与一个出版社的档次、领导的魄力和编辑的水平紧密相关。我非常敬佩山东教育出版社，不仅仅因为给我出过书，主要因为其不论在什么条件下总是坚持出好书，大力支持学术著作出版，那怕在经济收入上受损也要为学术事业的繁荣尽心竭

力。我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由衷地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与我有同感的作者和读者会不约而同地祝愿山东教育出版社欣欣向荣、昌盛发达！

1996 年春节前夕

目 录

引言	(1)
上篇 主体思维发微	(1)
发微之一 评判与建构：新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思维	(2)
客体与主体的反思	(2)
思维模式的建构	(9)
发现逻辑机制的运作	(20)
发微之二 特征与功能：文学史研究的收敛型思维 ..	(34)
收敛型思维的操作策略	(35)
收敛型思维的选择焦点	(50)
收敛型思维的合围优势	(57)
发微之三 开放与创造：文学史研究的发散型思维 ..	(67)
发散型思维的辐射机制	(68)
发散型思维的品格威力	(73)
发散型思维的特异效能	(84)
发微之四 多样与互渗：文学史研究主体思维构成 ..	(98)
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的相反相成	(98)
思维规律与思维品格的考辨	(117)
发微之五 坚持与拓展：文学流派研究的社会学 方法	(129)

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视角·····	(129)
社会学方法的三维度研究·····	(132)
多样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141)
中篇 宏观研究尝试·····	(145)
尝试之一 系统思维律：古典文学向现代转换的前	
奏曲·····	(146)
文化系统变化激发文学观念更新·····	(148)
知识群体是新旧文学转型的“中介”	
·····	(156)
文学结构内部调整呈现新趋向·····	(163)
历史曲折导致积累过程中断·····	(175)
尝试之二 思维交叉律：中国新文学总体反思与观照	
·····	(183)
新文学浓重的政治色彩·····	(183)
新文学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188)
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灵魂·····	(193)
新文学发展的根本途径·····	(199)
新时期文学的超越·····	(204)
尝试之三 思维纵横律：中外情爱文学对照观·····	(215)
情爱意识与情爱文学的同步性·····	(215)
中国情爱文学演进的三个逻辑层次	
·····	(222)
中外情爱文学的相似审美特征·····	(239)
尝试之四 思维重合律：中国现代纪游文学综合论	

.....	(256)
文体结构模态及其基本要素.....	(256)
山水文化意识与纪游文学流变.....	(272)
尝试之五 思维整体律：中国婚恋文学中的一个原型	
主题.....	(291)
勘探《雷雨》两性关系中的原始意象	
.....	(292)
揭示古今婚恋文学反复出现的原型主题	
.....	(299)
开掘原型主题的文化哲学意蕴.....	(303)
营构文学中两性平等的婚恋世界.....	(309)
下篇 文学史观探索.....	(321)
探索之一 关键所在：构建科学的文学史论.....	(322)
常见文学史观的四种类型.....	(322)
科学文学史观的构想.....	(325)
系统方法论的优越性.....	(329)
探索之二 一份答卷：“文学史观讨论”自由谈	(333)
重说我的文学史观.....	(333)
对文学史分期与“文学史回到文学本身”	
的看法.....	(338)
文学史结构中“史”与“论”关系	
的理解.....	(342)
各体文学史编著的操作原则.....	(345)
探索之三 双重叠影：深化新文学史研究断想.....	(348)

旨在研究现代国人的心灵历程·····	(348)
重在探寻新文学与历史变革的联系 ·····	(351)
尽力揭示多元文化思潮对新文学的 规范·····	(359)
探索之四 科学求实：抗战文学研究的点滴思考·····	(362)
正确理解新文学大众化的走向·····	(362)
深刻总结抗战文学的历史教训·····	(366)
探索之五 辩证思维：以相应文学史观透视相应文 本世界·····	(375)
辩证艺术的魔力与威力·····	(376)
置于纵向与横向交叉的坐标系·····	(385)
探索之六 锐意开拓：“中国新文学六十年”·····	(389)
“重写文学史”的主客观条件·····	(389)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界说·····	(395)

上篇 主体思维发微

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虽然不能说总是“老调重弹”，但确实“弹”了不少年。当然，也有专家型的自撰文学史问世多部，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果从文学史研究总体水平考察，学术深度不够是其通病。究其原因，除知识更新、观念转换进度缓慢外，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主体思维模式的重新调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从思维学的角度考虑，文学史研究是有思维方式、思维规律可循的，学术质量的优劣亦同主体思维紧密相关，因此必须探讨之。

发微之一

评判与建构：新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思维

客体与主体的反思

中国新文学史（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建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和编著，现已出版的新文学史著作据有人统计约一百多部；尤其近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繁荣。相比之下，“文学史学”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除了在报刊杂志上偶而能见到一些零星的文学史研究的文章外，尚未正式出版过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学史学”专著；即使在我国众多的“文艺学”（即“文学基本原理”、“文学概论”）的著述中也很少见到“文学史学”的专章，这与西方“文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则将“文学史学”作为其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学史研究阵地上掀起一阵“重写文学史”的风潮，这应该视为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文学史领域的强烈反响和操作应用，也是一种建构我国“文学史学”的合乎规律的呼唤；但由于种种原因使这“重写”的范围主要囿于现代文学史上的具体作家作品及一些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价上。且不论这些评价是否公允正确，就其“文学史学”意义来说，并未提供更多的富有理论价值的东西，缺乏对已有新文学史的整

体建构模式、主体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强烈反思评判意识。尽管这种从微观入手重评具体作家作品对提高现有文学史编著水平也是有益的，然而从宏观上来说“重写”的讨论应集中于“文学史学”的建构上。它是解决当前新文学史研究和编著徘徊不前、难以突破、总体水平不高、思维模式雷同等问题的关键所在。“重写文学史”的前提是重构文学史观，即在已有文学史的深刻哲学意义的反思基础上，首先调整文学史主体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和价值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重写”的理性自觉和整体建构能力。

实质上，建构“文学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新文学史研究和编著的操作意义上，也深蕴于对“文学史学”的理解和阐释里，“文学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的本来面目”即文学本体，而是研究者或编写者著成的文学史，也就是对文学史著作本身的研究，通称为“研究的研究”或“思维的思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文学史学”理解为“文学史哲学”，这不只是由于它研究的不是具体的文学史研究，而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对文学史主体思维的再思维，主要还因为是把文学史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探讨和把握，它所关注的不是具体作家作品、文学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乃是对文学史进行研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概念的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价值性等。《韦伯辞典》对“哲学”曾作过这样的界定：它的主要含义之一就是对人的基本信念与基本知识之基础（grounds）的批评性反思，以及对这些知识、信念所使用的概念的反思。这说明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知识”和“信念”本身，它要对之进行批评性反思的乃是知识和信念得以建立的“基础”（即基本原则或基本概念）是否可靠、是否有效、是否

科学等。这种具有思维方法意义的哲学并非是一种具体学科,是对具体学科的再研究再思考,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和广适性功能与文学史这门具体学科相结合,无疑则具有“文学史哲学”的基本特征。可见,文学史哲学所要考察和研究的对象是编著者据以建构“文学史”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标准依据等(即基本原则)。具体来说,文学史哲学家直接对话的对象不是已逝的种种文学现象或浩如烟海的作品史料,而是依据一定原则或框架将这些文学现象或作品史料建构成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从特定意义上说文学史主体则成了文学史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要提出质问:这样来确定文学史哲学的研究对象,岂不是文学史是文学史编著者制造出来的吗?这不是否定了文学史的“本来面貌”的客观性吗?我认为这种质问有一定道理,但也带有片面性。

“文学史”的总体构成不外两个大层面,一是文学发展的本身即文学史的本体,一是编撰者对文学演变过程的发见即对文学史本体的认识。这两个层面在“文学史”结构内部应该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然而又常常使编著者或文学史家在处理 and 把握两者关系中陷入不可调和的两难境地。有位著名史学家曾深有感触地说:“历史学家无论作何选择都面临困境,像所有知识的探寻者一样,他必然发现他的方法陷入两个同样有说服力的、但又互相矛盾的理论之中。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第二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我们的身份、人格、个性、宗教以及每一认识都形成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①由于文学史研究中内

① P. 戴:《艺术与生活》前言部分,1976年出版于纽约,英文版。

蕴着深刻的二律背反，致使被认识的历史本体与认识历史本体的主体之间总是处于矛盾的纠缠之中。虽然文学史研究者和编著者努力从认识论反映论上来探讨和把握文学史本体即那些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著成的文学史并非文学史本体的原生状或本来样子，而活现于我们面前的实实在在的物化态的文学史只能是遵循编著者文学史观或理论思维模式所建构起的文学本体。它不仅染上明显的主观色彩，而且也标明在处理历史客观本体与历史认识主体之间不可调和矛盾、并从而重构文学史本体过程中，认识主体的历史意识、建构模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以推想，文学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是文学史的建构主体，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意义也在于深刻地反思并重构文学史主体的史学模式。

长期以来，在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或编著新文学史的思维框架中，总是把历史的“客观性”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认定“客观性”是文学史研究的全部生命，它既是追求的起点又是追求的终点，唯此才能达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最高理想，这差不多已成为新文学史研究者和编撰者的思维定势。我们决不能否认这种思维模式的科学性和积极性，它不仅是对非历史主义或历史主观主义的有力反拨，而且在操作实践过程中的确有不少文学史专家和评论家将这种“客观性”的研究作为唯一可靠的路径来遵循，甚至倾注毕生精力来从事搜集史料、挖掘史料、考证史料、整理史料这项艰苦细致的基本工程，并将掌握史料的多少视为衡量史学“功力”深浅的最可靠的价值尺度和依据。如果史料一旦齐备，便塞进一个认为合体的理论框架，于是一部反映“历史本来样子”的客观论的新文学史便问

世了；同时认为只有这样的文学史才是认识已逝“文学史本体”的真正范本。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具有这种所谓“客观性”的特征。果真按照这条收敛式的思维路线将“客观性”研究作为唯一趋向，就能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吗？诚然这种研究可以接近文学史的本体，但是这恐怕是个永远不能完成的工程，也是个永远不能变成现实的理想。试问建国后不同时期编著出版的约百部新文学史，有哪一部真正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纷纭复杂的历史本来面貌？这里面各部新文学史在逼近历史本体上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假若说有一部新文学史比较完整地逼近了“文学史本体”，是否能断定这是一部具有最高学术价值的文学史？我并不这样认为，只能说它的文献价值较高；况且永远也不会出现那种穷尽“历史本来面目”的新文学史。这是因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带有相当的命定性，它们是已经过时的历史事实，今天我们参与文学史研究和编撰所选用的史料不可能保持原来史实的完整性和确凿性，也很难再现过去历史的全部真实；更何况我们后来者根本无法重新踏入前人经过的同一条河流再造既成的历史，现时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主要凭借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报刊杂志、书信日记、回忆材料等。这些只能算作记载已逝历史信息的符号，它们虽具有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却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的本体真实，即使有些研究者与过去的新文学史直接相关甚至亲身参加了现代文学史的创造，也不能笼统地说他们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由此我想到近十年出版或发表了数量不少的“现代作家自传”或者亲朋子女撰写的新文学作家传记，究竟这些著述有多大的“历史本体”的真实程度，它们的历史“客观性”到底如何，不能不使人们思虑或怀疑。我们只能承认

文学史也许有逼近“文学史本体”的客观性，但那种绝对的“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现代文学史的客体与当今研究文学史的主体分别处在各具自身规定性和特定文化氛围的时空中，它们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种种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硬要追求文学史的本体“客观性”以抹煞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其结果只能是以泯灭当今文学史研究主体特征来确保现代文学史的本源性。这不仅会导致站在现时编著的新文学史的当代感丧失殆尽，而且那种为当代精神所激活的蕴含于文学进程的生机也不复存在了，这样的文学史只是一种无感情色彩无主体意识的历史客观进程和种种史料的排列系统。尤其严重的是，因为众多新文学史研究者形成了对文学史本体客观性过分推崇的思维模式，造成了许多新文学史面目雷同、空前划一的景观，使研究者和编著者没有必要在治史的过程中反思自身的思维框架和建构模式，只能把文学史客体作为唯一的依据和指归，这必然导致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个性的缺乏。也许这也是造成新文学史编著整体水平难以提高和超越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不仅如此，纯客观的“文学史本来面目”难以穷尽还有个特殊原因：文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和主要建构材料是“作家作品”，尽管我们编写文学史在搜集这方面史料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它们具有不可穷尽性。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是人类情感的结晶和审美精神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难以品尽的审美味道，况且作品又是一种符号，它既与本体之间有一定“间离”也同研究主体之间有一定“间离”，彼此是无法统一的，这更增加了认知和把握文学作品本体的难度；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众多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文学活动是构成一部文学史的重要部件，然而我们现时能够纳入研究视野的仅仅是其整个生命和文艺创作